

序言

首先，祝贺蒋菁的新作《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选择问题研究》顺利出版！

自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来，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存在了100年。在过去100年中，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和建设方面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遇到了严重的挫折，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曾有过“急于过渡”的问题。所谓“急于过渡”，是指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在还不具备或不充分具备物质和文化的前提下，过早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宣布建成社会主义。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并开始向“各尽其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过渡。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宣布苏联进入全面建设共产主义阶段。这种盲目的冒进在现实面前，不断碰壁。1967年勃列日涅夫当政时，被迫后退，宣称苏联建成的是“发达社会主义”。1982年安德罗波夫上台后，又进一步后退，宣称苏联

尚处在“发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到了90年代初，随着苏共丧失政权和苏联解体，斯大林时期建立的社会主义也被历史所吞没。

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出现过“急于过渡”的问题。新中国建立前夕，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曾设想，中国将要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至少要15年以上，然后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实际上，中国从1953年就向社会主义过渡，到1956年即完成了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成了社会主义。按照毛泽东、邓小平的说法，中国建设的社会主义是“照搬”苏联的。随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弊端的暴漏，毛泽东从50年代中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而进一步划清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界限。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的社会主义必须经历的特定阶段，即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2050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的整个历史阶段。在谈到社会主义的长期性时，邓小平说了一段非常精辟的话：“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¹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国内外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不断校正、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使理论之树长青。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国把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强调改革“只有进行时”，通过改革推动社会主义的发展。恩格斯说，“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它任何社会制度一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379-380页。

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²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实践充分体现了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发展的设想。

关于中国为何放弃新民主主义，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这是长期以来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话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只有搞清楚这个问题，才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才能自觉地坚持改革开放。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出版了很多作品，不乏真知灼见。但是蒋菁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选择问题研究》选择了崭新的角度，即从上世纪50年代中国全面学习苏联、苏联全面援助中国来看中国提前进入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建国以前中共长期工作的重点在农村，没有管理城市、组织和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经验和人才。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只能依靠苏联的援助。本书通过梳理和分析苏联援华的历史，说明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全面性：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意识形态等。苏联不仅帮助中国打下了现代工业基础，而且帮助中国建立了一整套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理论体系。如果说，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么苏联全面援华则给中国送来了社会主义，当然当时送来的只能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这就是中国“提前”进入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因。这就是本书的亮点和创新之处。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全面学习苏联、苏联全面援助中国，这是中苏关系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中的大事，影响深远，许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希望作者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锲而不舍，继续前进，以新的成果和新的发现，贡献广大读者。

李静杰 2016年5月29日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第443页

前言

一、研究背景

中俄作为两个相邻的大国在 17 世纪前半期发生正式关系，两国关系历史长达近 400 年。1840 年鸦片战争以前的 200 年间，两国关系基本上是睦邻友好，两国关系是平等的。从鸦片战争到苏联解体，长达 150 年间，俄国是对中国损害最大和得益最大的国家，两国关系是不平等的。苏联在新中国的发展历史上扮演过极其重要的角色。两国关系发展十分曲折，历经了五十年代的友好同盟、六十年代的关系破裂、七十年代的全面对抗、八十年代的走向正常和九十年代的全面恢复几个重要阶段。苏联解体以后，中国与俄罗斯建立了平等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两国关系进入了全新的历史阶段。中俄在从“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到“建设性伙伴关系”，再到“战略性协作伙伴关系”和“全面战略协助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关系日益密切，不仅开创了中俄两国高层领导会晤制度化的先河，并使之成

为有效机制，还使中俄关系顺利地渡过了磨合期，走上了稳步、健康和全面发展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前，中苏关系有两条线：一条是国家关系，另一条是苏联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二者性质不同。纵观 20 世纪中国对外关系历史可以发现，中苏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国家关系：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苏联那样对中国的内部发展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20 世纪初，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通过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第一次使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并在上世纪 30 年代形成了高度集中、单一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的一批人民民主国家，相继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由于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曾经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这些国家又先后得到过苏联的支援，所以欧亚各民主国家在建立本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和制度体系时，都将苏联作为学习的楷模。可以说，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所有这些国家都仿照苏联的斯大林模式，从而确定了本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中国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也深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 28 年光辉历程时曾形象地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所了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苏联学习的。而苏联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更是被称作是“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对中国的思想意识形态和党政管理体系形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领导人决定在外交上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政策，这与苏联承诺对中国革命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援助有关。中国不仅接受了苏联的巨大援助，更是照搬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一五”计划）时期，苏联开始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技术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选择问题研究

援助, 156 个重点援建项目的建成, 使中国以能源、机械、原材料为主的基础工业初步形成规模, 从而建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此外, 苏联在制定经济计划、建设和改造大型工业企业及军队建设、教育发展、文化构建等多方面向中国提供了帮助, 除了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技术专家和顾问, 还为中国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技术干部, 这对我国建国初期的国家经济建设和各种管理制度的建立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对中国发展阶段的认识上, 中共领导人清醒地意识到, 苏联从 1917 年十月革命到 1932 年实行农业集体化, 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花了 15 年时间。而中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及其成分比十月革命时的俄国落后得多, 所以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更长的时间, 至少要搞 10 年、20 年或更长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这样算来, 最早在 1964 年才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当时中共领导的共识, 而且这一认识也得到苏联领导的认可。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中央政府按照苏联的模式, 开始优先大力发展重工业, 引进苏联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体系, 成功地进行了“一五”计划的工业化经济建设, 并在苏联的影响下大规模的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为了解决发展资金的问题, 中国学习苏联工业化的经验, 加快了农业合作化的步伐, 实行统购统销, 将资源进行高度集中和配置。结果到 1956 年, 中国就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实现了全国范围的农业集体化, 仅用 7 年的时间就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实践证明, 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给中国后来的社会经济发展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同时也不符合列宁提出的落后国家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工业化建设理论和管理制度, 都是照搬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 并不是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和制度。

本文试图从“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助中国的角度，分析学习苏联工业化模式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之间的联系，探讨中苏合作对中共领导人改变原来的认识和确定的方针，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客观原因。从苏联援助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选择问题，国内外尚无系统研究。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回答这个问题，正是本课题的创新之处。

有关剖析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原因在党史界和学术界都是一个理论前沿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但还未有从苏联援助这个角度来系统研究的成果。通过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深入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情况综述

多年来，中俄（苏）两国的学者对中苏关系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了多视角全方位的研究和梳理，从中苏关系史和中国现代史的角度对中苏关系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两国关系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特别是上世纪60—70年代，由于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局势，中苏关系从结盟到对抗，发生了很多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国内外学者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很多，主要涉及中苏关系走向、中苏同盟、苏联对华援助、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中苏经济合作（包括156项建设研究）、中苏经贸关系研究等，其中很多著作中都有章节谈到了中国第一个五年期间，苏联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大规模援助问题。此外，苏联在制定经济计划、新建和改造大型工业企业，以及教育、国防领域对华提供了援助，并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选择问题研究

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技术专家和顾问，这对我国建国初期的国家经济建设和各种管理制度的建立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在国家经济史、党史、领导人的回忆录和相关的中共中央重要文献选编、汇编以及档案资料中都有相关的文献记载。如：张柏春、姚芳、张久春、蒋龙：《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 1949—1966》；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1948—1953》、《中苏关系史纲》、《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 1945—1959》；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刘德喜：《从同盟到伙伴——中俄（苏）关系 50 年》；孔寒冰：《走出苏联——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许文鸿：《中共“一边倒”政策的形成》；阎明复：《亲历中苏关系——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的十年（1957—1966）》；向祖文：《苏联经济思想史——从列宁、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董志凯、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53—1957）；董志凯：《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156 项”建设研究 1950—2000》；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增订版）上下卷》；苏星、杨秋宝：《新中国经济史资料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实践的回顾》（上、下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集》；《中国共产党历史》；《刘少奇选集》；《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陈云文选》；《周恩来经济文选》、《周恩来年谱 1898—1976》；《刘少奇年谱》；《李富春传》等。回忆录有：《聂荣臻回忆录》；《师哲回忆录》；《李越然回忆录》；《阎明复回忆录》；《苏联专家与中国海军航空兵》；《冶金军工回忆录》；《回顾与展望——新中国的国防科技工业 1949—1989》等。涉及苏联在教育领域的对华援助方面的

著作：李涛：《借鉴与发展——中苏教育关系研究（1949—1976）》；李滔：《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黄利群：《中国人留学苏（俄）百年史》等，此外，关于苏联接收中国留学生方面，国内出版了一些较为详实的著作和纪实，如：周尚文、李鹏、郝宇青编著的《新中国初期“留苏潮”实录与思考》；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编纂的《学子之路——新中国留苏学生奋斗足迹》与《回眸——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成立二十周年1989—2009》；单刚、王英辉访谈创作的《岁月无痕——中国留苏群体纪实》等。

期刊方面，也有许多涉及中苏关系的重要文件和档案也陆续出版在各专业杂志，为该课题展开研究提供了依据，其中有：沈志华、李丹慧收集整理《1949—1965 中苏高层交往实录档案文件》；《关于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俄国档案文献》，《国外当代中国研究动态》1997年第1期；《关于1949年刘少奇访苏的俄国档案文献》，《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2期；《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会谈）》，《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4期；《建国前夕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部分俄国档案》，《党的文献》2002年第1期、第2期；《关于在华苏联专家问题（俄国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资料》总第82辑（2002年5月）；《关于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俄国档案文献（1953—1959）》，《国际冷战史研究资料》第1辑（2003年）等。

俄罗斯方面，俄罗斯科学院的远东所一直致力于中国问题和两国关系的研究，涉及50年代苏联援助中国这段历史。他们基于本国的历史档案资料，在这方面有很多具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除了远东所，还有一大批历史学家对这段历史的某个方面，如经济援助、中苏经贸关系，中苏军事合作等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如：O.Б.拉赫玛尼：《20世纪俄（苏）与中国的历史关系——主要事件的综述与分析》，莫斯科，2002年版（O.Б.Рахманин，К истории отношений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选择问题研究

России-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в XX веке – обзор и анализ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 – М., Москва, 2002) ; В.С.米亚斯尼科夫院士主编:《俄罗斯科学院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代文件集,上下卷》,莫斯科,2009、2010年版(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Архив РАН,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50-е годы –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в двух томах // Под общей редакции Академика В.С.Мясникова – Москва, 2009. 2010) ; 赵音聪(音译—译者注):《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援助1949—1959》,莫斯科,2003年版(Чжао Инцун,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мощь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е в 1949-1959 гг. – Москва, 2003) ; М.С.卡皮查:《两国伟大人民的兄弟情谊》,莫斯科,1959年版(Капица М.С. Братская дружба двух великих народов. – М., 1959) ; И.Н.基谢列夫:《东方国家科技史—苏中科学合作》,莫斯科,1960年版(Киселев И.Н.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научные связи // Из истории науки и техники в странах Востока. – М., 1960) ; А.库兹涅佐夫:《苏中经贸关系》,莫斯科,1986年版(Кузнецов А. СССР-КНР: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 М., 1986) ; Г.罗曼诺夫:《苏中经贸关系1949—1989》,莫斯科,1990年版(Романова Г.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9-1989. – М., 1990) ; О.Б.鲍里索夫、Б.Г.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80》,莫斯科,1980年版(Борисов О.Б., Колосков Б.Г.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5-1980.-М., 1980) ; Л.В.菲拉托夫:《苏联对华科技援助经济评价1949—1960》,莫斯科,1980年版(Филатов Л.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оценка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й помощ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Китаю (1949-1960). – М., 1980) ; 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苏联对华经贸关系历史1917—1974》,莫斯科,1977年版(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1917-1974). – М., 1977) ; М.卡皮查主编：苏联外交部文件《苏联—中国（1949—1983）—文件与资料（1949—1963）》，莫斯科，1985年版（СССР-КНР (1949-1983).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49-1963) / Под ред. М. Капицы. – М.: МИД СССР, 1985) ; О.伊万诺夫：《苏中关系历史中的一些史实》，莫斯科，1975年版（О.Иванов, Некоторые факты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 М., 1975) ; Т.Г.扎泽尔斯卡娅：《苏联专家与中国军事工业的形成（1949—1960）》，圣彼得堡，2000年版（Зазерская Т.Г. 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итая (1949-1960). – СПб., 2000) 。

此外，美国、德国等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也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中苏关系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与回顾。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德】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美】R.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 1949—1965》等。

关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的原因分析方面，史学界的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他们从理论、实践、国内外因素等多个的角度对提前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其中有不少文章谈到了苏联模式或苏联因素对其产生的影响，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杨奎松：《毛泽东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关于俄国模式的影响问题》一文中详细论述了俄国模式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演变的影响。范守信在《1949—1956 年党的战略指导方针的变化及其历史经验》一文中指出，由于我党对列宁关于过渡理论时期理论的某些论断和苏联 30 年代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验的教条式的理解，使得党对经济文化的落后性和由此带来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缺乏足够的深刻的认识，基本照搬了苏联的模式，滋长了“左”的急躁情绪，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朱佳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选择问题研究

的提前过渡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其基本观点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该文通过具体的文献和史实，从工业化建设的角度对国际环境的影响作了具体的分析，指出如果没有苏联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面的援助，中国不可能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也就不可能决定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李捷：《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及其历史意义》，认为毛泽东开始考虑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引发出来的，公私比例关系的变化和私营工商业的性质变化对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沙健孙：《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几点思考》，认为实现国家工业化是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原因之一，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适应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以实现国家工业化这个目标提出来的，即要实现工业化，必须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集中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从而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一书中具体分析了国际冷战环境下苏联援助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地位，指出当时的国际环境对中国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武力：《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的历史分析》认为，中国共产党对赶超型工业化战略的选择是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根本的原因；陈立中：《过渡时期总路线制定过程中的苏联因素》具体分析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制定过程中苏联所产生的影响，指出苏联通过影响力的作用将苏联模式慢慢在中国复制，从而引导了中国政策制定的“左”倾趋势。上述这些文章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提前进入社会主义的内外部原因，为本题展开的研究提供了参考。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有些著作虽然也谈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对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影响，但只是一般性的提及或阐述，而全面和系统地分析上世纪50年代苏联的对华援助导致中国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著作，至今尚未见到。本文的着重点是：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阐明苏联全面援助

中国，不仅给中国送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设备，帮助中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而且给中国送来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和管理，使中国提前进入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三、框架结构设计和研究方法

本文从结构上分为前言、正文九章和结束语三个部分。

前言

前言部分旨在阐明如下内容：研究背景、国内外研究情况综述，以及本书框架结构设计和研究方法。

第一章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这是本文的理论部分。19 世纪 30、40 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表明，社会主义取代的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但在现实中，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没有如马克思、恩格斯所预想的那样，首先发生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发生在了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对社会主义过渡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丰富。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结束了列宁倡导的新经济政策，加强了中央集权，逐步形成了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

第二章 毛泽东关于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设想

本章主要介绍了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在中国的演变。毛泽东结合中国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选择问题研究

革命的特点，在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对中国共产党掌权后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提出了最初的设想，为中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指明了方向。

第三章 新中国恢复经济面临的困境和全面学习苏联方针的确立

本章主要阐述了建国初期新中国恢复经济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和意识形态的趋同，不得不寻求苏联的帮助。中苏两党通过高层互访取得了相互的理解，在得到苏联援助的承诺后，中共宣布“一边倒”的既定方针，掀起了全面学习苏联的高潮。

第四章 苏联对华的全面援助

本章是全文的重点之一，以上世纪50年代初期苏联对华展开的全面援助为主线，从苏联政府帮助中国编制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派遣顾问和专家，以及帮助培养中国国家建设急需的技术和管理人才这几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叙述。苏联的全面援助，不仅推动了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还通过人才的请进来和走出去，教授和学习了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苏联模式。中国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基本全面复制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

第五章 “一五”时期的苏联援助和中国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确立

本章是全文的重点之一，试图分析苏联援助和中国确立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之间的联系。“一五”时期的“156项工程”，从项目确立、选址、勘探、建设、投产等各项工作都是在苏联的指导和帮助下进行的。苏联援建的“156

项工程”在很大程度上将中国直接引向了计划经济的方向，也促成了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逐步形成。苏联通过“156 项工程”的援助，帮助中国工业企业建立起了一套必不可少的现代企业制度。以鞍钢为例，进一步说明苏联援助对建立中国工业企业管理体系发挥的作用。

第六章 “一五”计划期间苏联在国防工业领域的对华援助

本章是全文的重点之一，着重对“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助的重点领域——国防工业领域所进行的援助按行业进行了深入的阐述，涉及兵工、航空、无线电子和船舶四大国防工业企业。通过对行业现状、援助方式、国防工业体系的构建等内容的逐一梳理，表明苏联在这一领域的重点援助对加快中国国防工业初创时期的建设进程，保证国防建设和战备急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七章 苏联在科技、教育、文化领域对华的援助与影响

本章是全文的重点之一，着重从苏联对华的科技援助、按照苏联模式推行中国教育改革，以及中苏在文化领域的交流和影响三个方面进行论述。苏联的“一揽子”援助，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帮助中国初步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基础工业和独立的、门类比较齐全（包括陆海空三军所需的各种主战装备）的国防工业体系框架。教育方面，按照苏联模式实施院系调整、推行苏联式的教学计划和专业设置等改革后，中国建立了一整套苏联式的高等教育体系。文化领域，中国通过中苏友好协会遍布全国的组织机构，为全面学习苏联，加强中苏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苏联通过各种文化交流方式，对中国的美术界、文学界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八章 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和农业集体化道路

本章介绍了苏联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和农业集体化道路探索的影响，论述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和农业集体化道路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对中共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背景，以及在苏联帮助下进行工业化建设取得的成就做了阐述。由于在工业化过程中得到了苏联的全面援助，在赶超型的工业化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必须加快对农业合作化的步伐，从而促使农业改造的速度一再加快，最终带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

第九章 中国比与预计的时间提前 11 年向社会主义过渡

本章论述了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带动下，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匆匆完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手工业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单一公有制，在短期内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最后总结了中国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苏联援助给中国的这次重大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几个方面的影响。

结束语

实践证明，在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能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急于过渡，而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为建立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和文化前提。在历经了曲折的探索之路，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才在邓小平的指导下，总结了过去急于过渡，“穷过渡”的教训，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下定决心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真正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巨大成就，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本课题的研究采取了文献调查法和历史研究法，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大量使用国内外的档案资料和公开出版物，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综合分析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等方法，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